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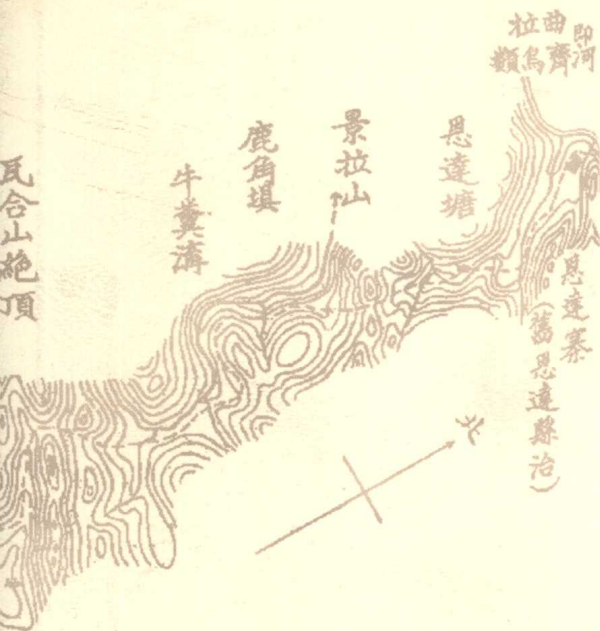
# 任乃强藏学文集

西康图经

境域篇

民俗篇

地文篇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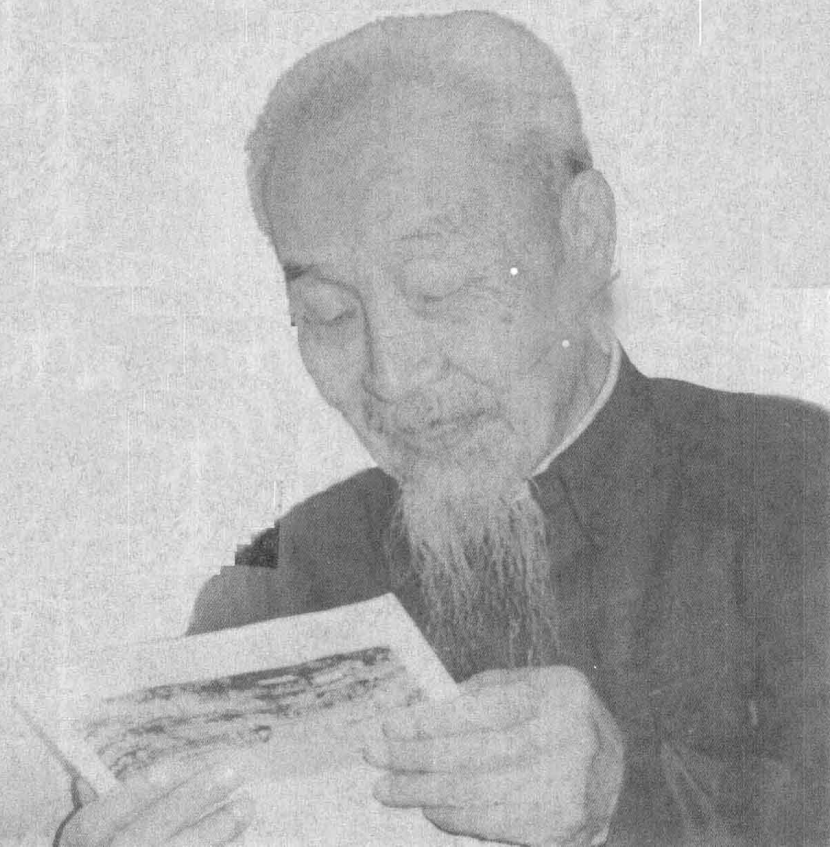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 丽 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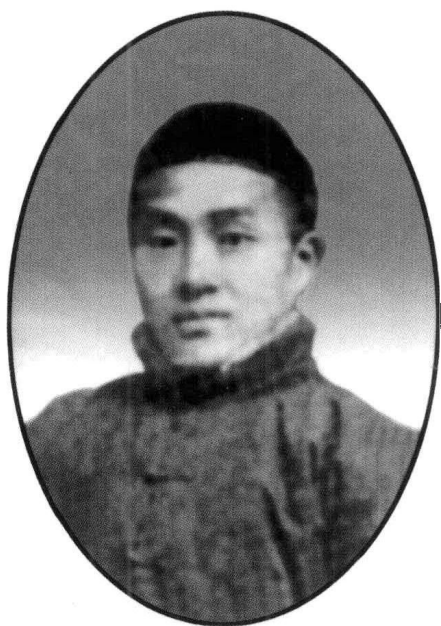
# 任乃强藏学文集

西康图经 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





任乃强（1894—1989年）



北京农业高等专门学堂（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毕业照  
（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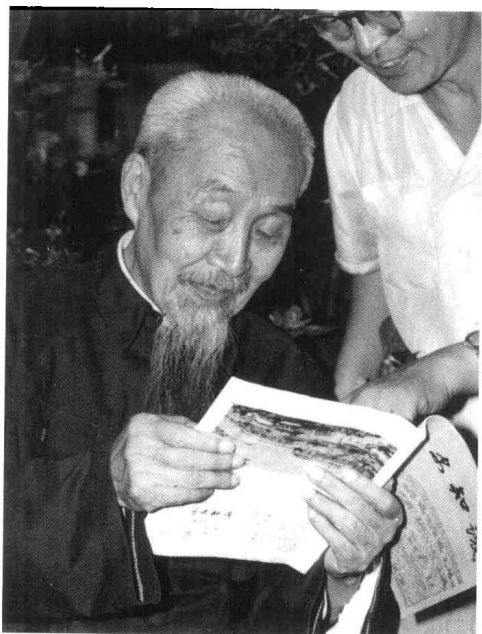


1962年与子（新建）、媳合影



任乃强与夫人罗哲情措（藏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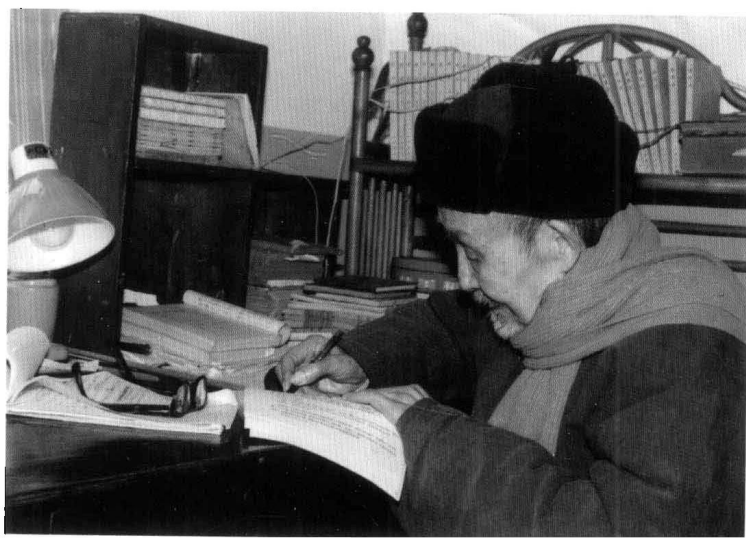
诲人不倦（摄于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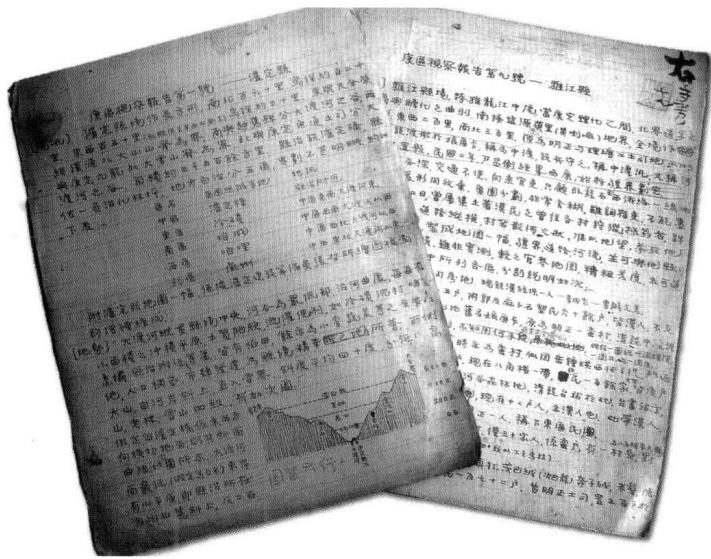
1987年在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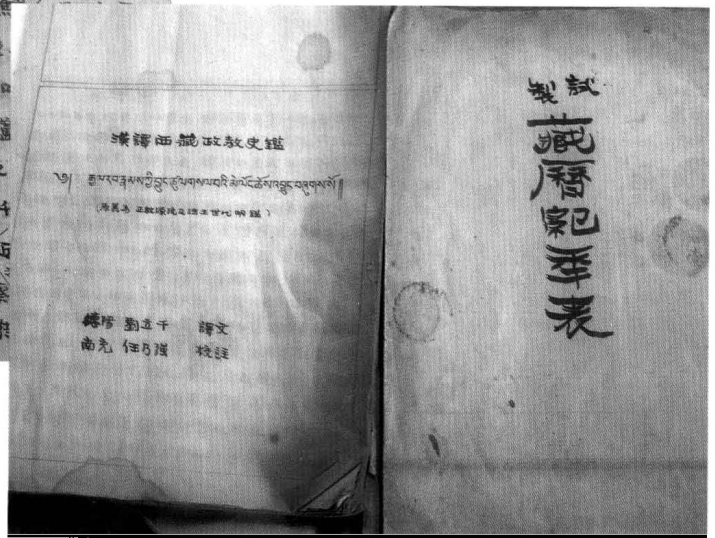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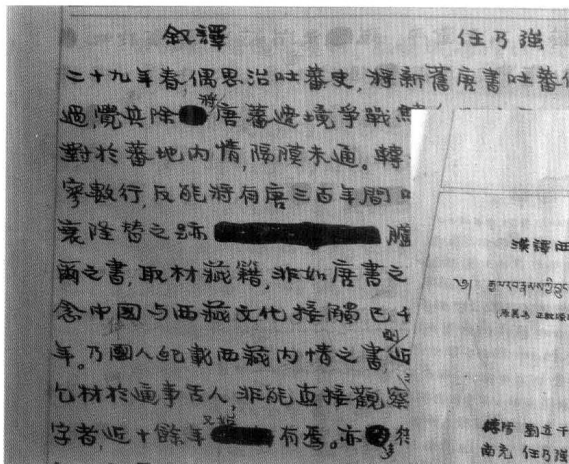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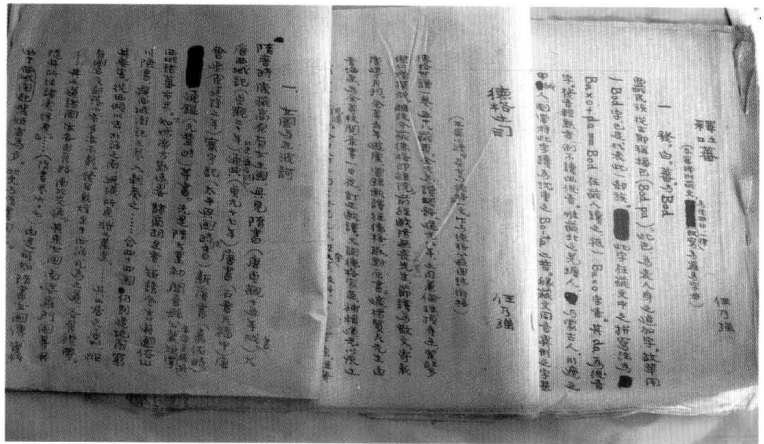
与好友李安宅（左）、刘立千（右）在一起（1981年）



晚年仍笔耕不辍  
（摄于1989年1月，  
去世前两个月）



任乃強手稿



##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序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 任乃强小传

任乃强，字筱庄，四川省南充县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藏学家，我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开拓者。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四川历史学会顾问。曾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1989年3月30日逝世，享年96岁。

任乃强先生1894年农历三月初一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农业学堂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曾被捕入狱，后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旋返川，协助张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28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又名《乡土史讲义》）。

1929年，应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之邀，以“边务视察员”名义，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九县。风餐露宿，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各县视察报告》等文。

为冲破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在这次考察中，与藏族女子罗哲情措结婚。在她的帮助下，自1932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



经》之《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卷。此书发表后在图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的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31年自赴天全、泸定，参与川康公路选线。攀藤附岩，历经艰险，踏勘累月，提出二郎山段修筑方案，为当时川康公路和解放后川藏公路建设选定了路线。

1933年应张澜先生之邀，赴广西等地考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返川后相继任重庆大学教授、省三中校长等职。

1935年，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36年再次入康。继续完成了对西康各县之考察。为废止乌拉制度，倡办“牧站联营”，发起成立西康牧运公司。

1940年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为撰修第一部《西康省通志》殚精竭虑，广集博征，做了大量工作，撰有《西康通志纲要》一卷。这一时期，他遍阅康区旧档和珍藏之藏文秘籍，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撰成《康藏史地大纲》，校注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等书，并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为弥补史志缺略，先后对泸定、天全、芦山、宝兴等历史上汉藏民族交接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广泛采集资料，撰成《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主持发掘了王晖石棺等重要文物，撰写了《樊敏碑考》、《芦山汉石图考》等专论，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在康藏考察中，他深感康藏地图缺失之弊，遂潜心致志于康藏地图之测绘研究工作，每至一地必亲身踏勘，绘制地图。更以自己十五年来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并在和平解放西藏时被作为进藏用图之蓝本，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3年，受华西协和大学之聘，任社会系教授兼华西边疆

研究所研究员。次年，与李安宅先生同率华大考察团赴康藏地区北部考察，着重对德格等地寺庙和土司进行了调研。返川后，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对元以来康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藏传佛教之发展，作了深刻剖析，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任乃强先生是我国“格学”研究的先驱者，早在1930年，他就发表了我国首篇汉译的《格萨尔》。1944年至1945年，又相继发表了《“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等文，在国内首次全面地对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性质、卷帙、版本、内容和特色进行了研究，所提出的“格萨尔确有其人，即林葱土司之先，亦即《宋史》之唃廝囉”等论点，在国际“格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6年，任先生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为推动国内的藏学研究，他联合国内外著名学者，发起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创办并主编《康藏研究月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刊29期，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的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合作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成为我国藏学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1950年，任先生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他的不少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此后，由于“左”的错误，令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即使在被错划为“右派”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多部专著。尤其是1961年撰成了近150万字的鸿篇巨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积其40年研究之心得，对晋代常璩所撰的中国第一部方志《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系统地考证和论述了大西南地区上古至东晋时期的历史、地理、

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解析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驳斥了前人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1987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的冤案得到改正，年已耄耋的他，仍笔耕不辍，以超人的精力，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所写的《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和采纳，为开发康藏资源作出了贡献。年逾九十，仍亲为研究生授课，为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不遗余力。

# 整理说明

任新建

## 一

1989年春，已届96岁高龄的父亲和往常一样，早餐后便坐在书桌前开始一天的写作。从头年冬季开始，他就着手于《“前四史”青藏高原地区史料疏证》写作，雄心勃勃地准备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正史中有关青藏高原地区历史、地理和民族的一些史料钩沉出来，探讨这一地区早期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关系。这是一项浩大而繁难的工程，对于年迈的他来说，无疑太过繁重。但他却兴致甚高，以此为乐趣，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六七个小时。然天不佑人，这天上午10点左右，他在写作时突然中风。此后一个多月间，辗转病榻，体力迅速衰竭，终于3月30日溘然去世，在病中他仍时时念着这部著作没有完成……

转瞬之间，父亲仙逝已20年了。然而，每当我坐在他的书桌前时，他那伏案专注写作的神情仍宛在眼前；每次翻阅他遗存的一叠叠泛黄的笔记和手稿，总是感慨万千，脑海中常常不由地

浮想起当年他一个人穿着厚厚的长袍，顶着风雪牵着马，在高原陡峭的山道上踽踽独行、艰难攀登的情形……这些年来，我在康藏地区考察时，常听当地藏族干部和故老提起他的名字。使我特别欣慰的是，人们在盛赞他对康藏研究的贡献时，往往于满怀敬佩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亲情，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已经把父亲当成康巴人的一分子，为康巴地区曾有他而自豪。一个汉族学者能得到藏族人如此普遍的认同，早已超越学术本身，而升华至民族亲情。它使我对父亲一生的康藏情结，有了真切的感悟。

父亲一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共撰有专著 25 部、论文 300 多篇，在历史学、地理学、藏学、民族学、文献学和文学、农经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有卓著的成就。不过，正如他所说：“余六十年来所有论著，莫不围绕康藏民族问题。”无论从时间和投入精力上看，藏学研究都是他毕生致力于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他在康藏史地、社会、民族、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使他被公认为我国现代藏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关于父亲在藏学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在 2002 年由全国“格办”等十余家研究机构和大学举办的“格萨尔千年纪念暨任乃强学术研讨会”上，曾被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 他是我国康藏研究的开拓者。他最先对康藏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政区沿革、社会文化、民族民俗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考察研究，“开康藏研究之先河”，奠定了我国康藏研究的基础。不仅使国内外第一次客观真实地了解康藏地区的面貌，而且启迪了学术界对康藏的关注，开拓了藏学研究的领域，树立了藏学研究经世致用的新风。他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撰写的《西康图经》，以及后来所撰的《康藏史地大纲》、《吐蕃丛考》、《德格世谱》等著作，对我国藏学、边疆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他是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发掘者与研究者。他于 1929 年在《四川日报》发表的“藏三国”，是我国第一篇汉译的《格



萨尔》；他关于“格萨尔”的原型为邓柯林葱土司之先祖、宋代之唃廝囉的论断，在国际“格学”界拥有重要影响；他首先将《格萨尔》定性为“诗史”，并对其版本、内容和审美价值、民间影响等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奠定了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建设的第一块基石”。

3. 他在康藏研究领域内驳斥了前人诸多谬讹，创立了大量新说，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藏学研究，他的不少研究成果成为我国藏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如对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附国非吐蕃的考证，东西女国的考证，德格、明正、天全等土司世系的考证，《唐书·吐蕃传》地名的考证，以及关于青藏高原为中华古文明发祥地、打箭炉源于“打折多”、古“昆仑”为冈底斯山等创说，都发前人所未及，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其成果亦被国内外广泛引用。

4. 他是我国现代康藏全图的第一位绘制者。上世纪40年代，他在环境极为艰苦、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绘制成了我国第一张圆锥投影、经纬度定点、汉藏英三种文字对照的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西康分县地图》，填补了我国康藏地学上的一项重大空白，并为后来解放西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5. 他发起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创办了《康藏研究月刊》，在我国藏学发展史上，开创和推动了藏汉学者合作、藏汉文资料并重研究的新风。并将藏学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宗教、文化层面展拓到政治、经济、地理、典籍等层面。

6. 他是川藏公路线路的最初的选定者。1931年他受川边屯垦司令部之请为川康公路选线。披荆斩棘，攀藤附葛，翻越马鞍山（二郎山），实地勘察“茶马古道”，探寻合理的川康公路线路，提出了由天全两路口经二郎山到康定的线路方案。1939年，修筑川康公路时即采纳此方案，新中国成立后的川藏公路亦以此为基础而修建。

7. 他是我国最早按现代农业经济地理理论与实地考察，提出藏区农业区划的人。1960年他为中国农科院编制“全国农业区划草案”而撰写的《川、康、藏农业区划意见》，对康藏地区农牧业经济地理区划产生了积极作用。

8. 他是第一个用历史地理学方法研究藏区黄金资源者。1977年他提出的《青藏高原采金刍议》，运用历史地理学将藏区划分为九个产金区，推导出一批可能富金的地域和矿点。该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采纳。各地按照他的建议，相继发现了不少金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区的黄金开发。

.....

父亲生长于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我国的内忧外患年代，和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忧患意识。早年他受“以农立国”思想的影响，专攻农业经济地理。参加“五四”运动后，又投身于“教育救国”，协助张澜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中学，任教于重庆大学等学府，极力倡导“教育改革”。后来，因“痛感列强对藏覬觐，而国人向对藏事扞隔”，又深入于康藏问题与西南边疆民族历史地理之研究。他在70多年学术生涯中，以宏博的学识，大家的风范，形成自己鲜明的学术特点。根据学界的评论和我耳濡目染的感受，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1. 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是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

他十分厌恶脱离实际的空谈，认为“知识只有反馈于社会、造福于社会才有存在的价值”。故“经世致用”是他一生治学的追求。当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为西康是否建省而犹豫不决之时，他及时地写出了《西康图经》等作，分析论证了西康建省的必要与可行性，促成了西康省的建立；当深悉康区“乌拉病民”问题时，他提出并亲身实施“牧站联营”的办法，以图解除“康人乌拉之苦”；他针对康区社会的特点，深入研究藏传佛教与康藏政治的关系，提出“治康首在利导其教”的建议，对当时西康省民族关系的改善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一直将自己的研究用于促进康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在康

藏的农业、水利、交通、矿产、生药等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做过很多研究，提出过许多独特的建议。他的许多研究成果不仅独步一时，对当时国家的统一和康藏开发起到过积极作用，而且至今仍可为研究、制订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宝贵的资料和借鉴。

## 2. 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是他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场

在康藏研究上，他毕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藏族同胞真挚的感情。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之时，他先后发表了《致黄专使的信》、《本年西藏政变始末》、《检讨最近之藏区》等文，揭露“西藏问题”真相，抨击分裂活动；解放西藏时，他尽平生之学，积极为进军西藏献策，无偿地捐献出他数十年心血所绘的地图，为解放西藏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批驳了那些视康区为“蛮荒”的错误，大力将藏族优秀文化介绍于国内外，努力促进汉藏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维护汉藏民族团结。他对藏族人民一直怀着深切情感，早在30年代初就提出了康人有“四大美德”之说。他一生始终有一种特殊的康藏情结，眷恋着这片土地和人们，真诚无私地希望用自己的学识帮助他们。

## 3. 史地参证、综合研究是他独树一帜的治学方法

他治学涉猎广博，穿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主张并善于运用跨学科多角度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藏学是门综合学科，需要“杂家”。藏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仅依靠单一的学科知识、有限的文献资料，是难以完全解决的，必须从多学科视角来综合、比较研究。他认为“地理因素乃是影响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起着制约或促进该民族发展的作用”。由于藏族所处的青藏高原是极为特殊的地理区域，其自然环境、政治地缘，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对藏族和藏区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发展和国家的安全统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尤其应把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等学科知识及研究成果融入于藏学研究之中，才能使藏学有所突破，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事实上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是堪称

“独树一帜”的藏区地理研究。他的著作几乎都彰显着“左图右史”、“史地参证”的特色，而且往往将史学、地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交融，有机地运用于藏学研究中，具有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 4. 不断求索，敢于创新是他一生实践的学术精神

他一生充满求索精神，在研究上善于探幽索微，敢于创立新见。他认为由于藏区地域广大和独特，加之过去民族文化扞隔，前人和现在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及不足。在藏学研究上，必须视野开阔，不囿成说，勇于探索，才能辨伪发覆，求得新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宁愿抛弃优裕安定的生活，冒着危险，深入于被世人视为“蛮荒”的康藏考察。每至一地必踏勘测绘地图，调查地方人文，“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加以研究。正是依靠这种求索精神，使他有許多“发人所未见”。例如史诗《格萨尔王传》，在藏区已广泛流传千年，但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内地还无人知道这一藏文化瑰宝。尽管到民国时期，关于西藏及其他藏区风土人文的汉文著作已多达数百种，然而，却看不到有关《格萨尔》的一星半点记述。他1929年考察西康时，在新龙县与我母亲结婚。婚庆期间，他被许多人每天如痴如醉地赶来听《格萨尔》说唱的现象所吸引，从而开始研究《格萨尔》，发掘其文化价值。首先将其译为汉文，介绍到全国。后来又专门赴德格等地考察“格萨尔王”的原型和遗迹，收集有关文献和口碑资料，对《格萨尔》进行了全面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说，从而为我国后来“格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如，藏药“独一味”，过去作为一种秘药，长期不被人知。他在康考察时，从自己亲身所受，发现此药的特殊价值，从档案和藏医药典查找其历史记载，从民间口碑中探寻其效用，还亲自上山采集，研究其生长构造。为了将此药介绍到内地，并通过此药引起全国对开发康藏的兴趣，他连续撰写了几篇专文，还在成都作了《从独一味看开发边疆》的专题报告。在他的发掘